

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杨晓军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党的对外工作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形成了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理论逻辑上，发展了党的对外交往基本前提、重要保障、根本遵循、价值取向的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赓续发展；历史逻辑上，基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立本固基、全面开展、提级加速的历程，发挥了政党外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实践逻辑上，突出完善政党外交的建设向度、提升政党外交的量与质、优化政党外交的运行机制、协调政党外交的统筹维度，完成了对政党外交在新时代的现实建构。

[关键词] 党的对外工作 习近平外交思想 政党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式现代化

202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对外工作要“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①。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从并服务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从学理性视角分析其理论、历史、实践的内在逻辑，对发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赓续发展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持续以政党外交实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外交往的基本前提、重要保障、根本遵循、价值取向等，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坚持服务党的历史使命是党的对外交往的基本前提

服务党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往的基本前提。早在 1848 年，马克思恩格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及其运作机理研究”（23CDJ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47 页。

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共产党宣言》时，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的是，消灭以旧的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②，实现共产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往的逻辑前提。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使命的思想，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为了摆脱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桎梏，必须以更大毅力继续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且必须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为止，因为这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所必须走的第一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使命的应有之义，而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③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因此，积极发展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关系、促进国际联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在依托政党外交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了中国化表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自觉将“建立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④，积极开展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助力中华民族“站起来”，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改造中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和新社会’”^⑤的历史使命，积极发展同苏联共产党等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助力中华民族“站得稳”，为奠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改革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国共产政党外交的历史性转变、全方位开拓和跨越式发展，助力中华民族“富起来”，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担负起“强大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⑥的历史使命，依托中国共产政党外交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⑦，不断扩大“朋友圈”，推动同他党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积极探索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页。

③ 《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1页。

④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7页。

⑤ 唐皇凤：《使命型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经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⑦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页。

党交流合作网络”^①，“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②，不断提质增效，推动党的对外交往的机制化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稳定性政党力量。

（二）坚持相互合作是党的对外交往的重要保障

坚持相互合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③。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联合，即政党合作是目的达成的重要方式。列宁结合俄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政党生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外交往中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④，还要争取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并肩作战，从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作对象。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以政党合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巩固同“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⑤的团结，遵循这一国家外交框架，以团结为核心要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⑥党际关系基本原则。以此为遵循，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⑦，把党的对外交往对象由共产党扩大到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旨在拓宽政党合作以促进国家合作。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党在对外交往中要“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⑧，将促进政党合作上升到国家纲领层面。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⑨，着重整合官方和民间两种资源协同助力政党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不同国家各类政党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⑩，并对政党合作的性质、内容、方法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就性质而言，属于非同质合作的

①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0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④ 《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1页。

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0页。

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⑦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⑨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1页。

⑩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页。

范畴，即不同政党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有所分工的合作。这就需要各国政党“秉持平等与尊重、开放与包容的原则”^①，共享机遇，同迎挑战。其中，大国大党更要正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自觉分享现代化道路上的成功经验，主动承担现代化道路上的共同挑战。就内容而言，不仅包括各国政党为了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同类挑战而进行的横向合作，而且包括各国政党为了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挑战而进行的纵向合作。当前，全球各类危机和挑战错综复杂，经济复苏乏力，发展鸿沟持续扩大，生态危机严峻，冷战阴云挥之不去，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由此可知，不论是各国政党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单一领域面临的横向问题，还是超出单一领域所面临的纵向问题，都阻碍了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各国政党亟需拓宽横向合作范畴，深化纵向合作深度，携手应对现代化之路中的挑战。就方法而言，要积极促进政党合作的机制化发展。政党合作的机制化关乎政党合作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而多形式、多层次的政党交流对话平台是促进政党合作的重要依托。因此，要构建全球政党对话合作网络，推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对话平台的机制化发展，为不同政党携手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平台支撑和机制保障。

（三）坚持独立自主是党的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

奉行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既重视政党合作，也强调独立自主，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各工人团体“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定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②，“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③，从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外交往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列宁继承了这一原则，1914年，他在致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指出，“我们是自主的党……任何人无权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④，申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外交往中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政党外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主“每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⑤，反对“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⑥的霸道行径，倡导兄弟党之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干涉他党对国家现代化之路的探索。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一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应当由本国的共产党独立处理”^⑦，“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⑧。

①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共同倡议》，《人民日报》2021年7月8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9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3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⑦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独立自主的党际交往之于国家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坚持“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发展方针，持续扩大政党外交对象范围，丰富政党外交内容，独立自主地开展党的对外交往，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①的新型政党关系理念，推动了对外党际交往原则中独立自主内涵的时代化发展。求同存异就是承认理念、信仰、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分歧，主动探求最大公约数，其中，“存异”要求各国政党在对外交往中保持自主性，“求同”则要求各国政党正视差异，尊重他党独立性，以促成政党合作。相互尊重就是倡导各国政党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尊重他党的利益关切、思维方式和道路选择。互学互鉴就是不输出本党模式，不推行干涉主义，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实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简单来说，就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互相补充与协同共进。总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都蕴含着对独立自主的坚守。

（四）坚持人类解放和进步是党的对外交往的价值取向

促进人类解放和进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往的价值取向。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往的价值所指，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一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②，阐明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目标，本质上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追求人类解放和进步的初心使命。列宁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实践层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③，就直观地体现了其对人类发展前途的关心。

中国共产党在以政党外交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奉行“和平为上”外交思想，在党的对外交往中奉行“一边倒”理念，坚持“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构想，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保障了国家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政治前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对外交往中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原则，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坚持“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发展方针，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④，弘扬“合作共赢的精神”^⑤，推动共同繁荣的同时，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

①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4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6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1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引领本国人民“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外交的价值取向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人类命运与共，人类整体性和命运共同性是其本质特性。循此逻辑，以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各国政党要对人类身份的整体性有清醒认识，明确“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②。这就需要不同国家各类政党打破“零和博弈”的对峙思维，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秉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不同政党要对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有正确把握，深刻认识“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③。这就需要不同国家各类政党摒弃“本国优先”的霸道逻辑，坚持人类命运共同把握，全球事务共同治理，国际规则共同书写，发展成果共同享用。总的来看，以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从政党视角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二、中国共产政党外交服务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传承

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内政。中国共产政党外交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渐进发展，为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历史根基，内在地孕育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立本固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政党外交服从并服务于以“四个现代化”为重点任务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立本固基贡献了政党力量。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着力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围绕“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展开，以期“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④。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路线规划由实现“国家工业化”拓展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⑤，实现了对现代化认识的战略性发展，为党的对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具规划性的方向导引。

坚持“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中国共产政党外交在交往方针上贯彻“一边倒”政策，

①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55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54页。

③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73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致力于抵御帝国主义阵营的威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在交往对象上，重点发展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争取苏联共产党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支持、技术援助、人才帮扶、设备支援。在交往内容上，突出借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有关经验，主要是学习苏联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在政党外交的推动下，中国获得了苏联大量援助。工业上，苏联援助中国采矿、冶铁、石油化工、能源开发等重工业的发展，并援助中国民用工业的建设。农业上，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农业机械设备、兽药和人工授精技术、水利工程和农业科技等，还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企业和实验站。交通运输业上，苏联援助中国修建铁路、公路、桥梁、机场、隧道、港口等基础设施。国防上，直接输送武器的同时，苏联帮助中国完善军事力量体系。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中苏两党于20世纪60年代因意识形态分歧展开论战，导致苏联对中国援助的终止，并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但这并不能否定苏联援助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总的来看，和谐的党际关系促进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推动了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打下了坚实基础^①。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接力棒”，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③，即“小康之家”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由“四个现代化”发展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成为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具象化表达。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行了整体谋划，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④。遵循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逻辑，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⑤，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中国现代化的设计蓝图，提出建设更高水平、更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⑥，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拓展为“四位一体”。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为出发点，以“小康”表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形态^⑦，为党的对外交往提供

① 参见包心鉴：《现代化：新中国70年的不懈探索和辉煌历程》，《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6期。

② 《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③ 中共中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⑥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0页。

⑦ 参见董慧、胡斓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1期。

了指引。

以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为目标导向，中国共产政党外交在方针上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坚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奉行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的策略，为助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理论遵循。在交往对象上，恢复与调整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开展同亚非拉地区民族主义政党的往来，建立同西方社会党的联系，发展同西方国家其他政党的关系，妥善处理同苏联东欧地区政党之间的关系，展开同政党国际组织的广泛交往，为现代化建设培育外源性驱动。在交往内容上，聚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开辟“政党搭台、经贸唱戏”的新思路，为政党外交注入经济因素。在运行方式上，促进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动能。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8942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①，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党外交的积极推动。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政党外交服从并服务于以“小康社会”为核心要义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富起来”开辟了光明道路^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级加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和“强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立足点。其中，“全面”指的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广度进行了规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才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海洋强国四个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科技强国、交通强国、航天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贸易强国、网络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九个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农业强国的目标。这十四个目标涵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方面，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着眼点。“强国”指的是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之高，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高度进行了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强国”的评定标准进行了明确表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③。“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综合评定标准。而“领先”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的新规划。

服从并服务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政党外交在对外战略上强调奋发有为，推行引领式外交，注重对国际社会的方向引领、理念引领、认知引领和责任引领。在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

② 参见包心鉴：《现代化：新中国70年的不懈探索和辉煌历程》，《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6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5页。

交往方针上遵循“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理念，从命运与共视角为政党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方案，开辟了全球治理新思路。在交往布局上，打造全球政党关系网络，巩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基础。在运行方式上，有侧重地推动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发展，突出表现为加强同大国大党的机制化交往，助力中国同其他大国关系的发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美好愿景到丰富实践的跨越，集中体现为党在对外交往中着力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载体，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党对话平台和协商机制，有效推动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技术合作、资源共享等，在“广度”与“高度”的交融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中国共产政党外交的现实建构

实践是理论的归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政党外交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提级加速。持续发挥政党外交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助推作用，需要完善政党外交的建设向度、提升政党外交的量与质、优化政党外交的运行机制、协调政党外交的统筹维度。

（一）完善政党外交的建设向度，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完善政党外交的建设向度，需坚持完善党的建设和外交建设，使得政党外交持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内生力量。一方面，要持续提升党的国际影响力，即提高党的理念在国际上的引领力，以及国际社会对党的理念的践行力。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旗帜”^①，是提升党的引领力的关键理念。因此，中国共产党要积极举行吹风会、宣介会等系列宣传活动，深化国外政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认同，提升理念的传播力；敢于直面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质疑乃至歪曲，增强理念的疏导力；着力巩固同周边国家政党的关系，活跃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流，推进同发达国家政党的机制化交往，拓展同新兴政党的联系，织密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激发政党凝聚力，强化理念转化力。而强化理念转化力不仅是提高理念引领力的基础，还是提高理念践行力的前提。然而，持续提升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力，不能仅依靠理念的转化力，还需要“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②。

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国家外交建设。中国共产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31 日。

② 刘建超：《共同书写世界现代化故事新篇章》，《当代世界》2024 年第 1 期。

部分，需要“遵守国家外交基本原则”^①，于国家外交框架下运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明确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外交层面的基本遵循。循此逻辑，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也就是要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③。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以和平方式发展中国，不断壮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同时，敢于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威胁世界和平的行为作斗争，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做共同发展的促进者，也就是要致力于“促进全球发展繁荣”^④。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发展与世界繁荣的同频共振。

（二）提升政党外交的量与质，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政党外交则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优势手段。因此，要不断推动政党外交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一定数量的交往对象是政党外交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加深同已建交政党的关系，主要是深化同执政党之间的往来，密切同在野党之间的交往；重视同大党之间的联系，尊重同小党之间的关系；加强同传统政党之间的交流，增进同新兴政党之间的沟通。同时，发展同未建交政党的关系，关键是不断加强同此类政党所属国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扩大国家利益交汇点，以国家关系的发展带动政党之间的交流合作，为政党关系的建立夯实根基。此外，充分利用多边政党外交平台，促进中国共产党同此类政党的增信释疑，为双方关系的建立创造条件。

不断提升政党外交的品质是政党外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坚持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党的对外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⑤。基于此，应当持续推动政党外交质的提升。首先，明确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的政治属性。这就需要党在对外工作中强化政治引领，“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⑥，推动完善党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增强对关涉党的对外工作各部门、各领域的统筹协调，优化党的对外工作布局，拓展“政党+”模式内容。其次，明确党的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功能。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国家总

① 王韶兴：《政党政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1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④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⑤ 参见刘建超：《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对外工作崭新篇章》，《当代世界》2023年第1期。

⑥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

体外交的核心要义。因此,党在对外交往中要积极构建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努力搭建多形式、多层次的全球政党合作网络,织密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引领、固基、统合、拓展、协同”^①等战略作用。最后,明确党的对外工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体现的特色优势。“大国外交”是履行更多国际义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外交,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其集中体现^②。因此,中国共产政党外交要胸怀天下,秉行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依靠自身的人脉优势、理论思维优势、深度战略思考优势”^③,推动完善包括器物、制度和理念在内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④,实现“大党外交”与“大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自洽。

(三) 优化政党外交的工作机制,完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保障

完备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充分激发政党外交各要素的活力,为政党外交高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机制保障。中国共产政党外交的工作机制是通过创建和完善各类双边、多边共商交流机制,汇聚全球政党所拥有的资源,形成的动态、长期、稳定的建交预期和开放、交互、立体的政党交流互通总体体系^⑤。基于此,持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政党力量,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党的对外交往机制。其一,健全双边对外交流机制,主要是维护和创新政党交流模式,拓展政党互动方式。在维护政党高层互访、执政党交流机制、政党定期对话和论坛机制、政党理论研讨会等现行机制的基础上,推动政党双边对外交流机制的行稳致远,并尝试更有利于政党双边对外交往的新机制。此外,在传承致电、致函、传递文件、派遣中共代表团、接待他国政党代表团等传统政党交流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政党“云交往”。其二,完备多边对外交流机制。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同社会党国际等政党国际组织的联系、拓展同欧洲议会党团的交往、参与政党国际会议,还要积极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领导人峰会等多边主场活动,充分发挥主场外交优势,促进政党多边交流的开展。

另一方面,要不断推动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发展。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发展以政党外交指导原则为根本遵循,以政党外交机制为基础条件,以政党外交实践为检验标准^⑥。因此,不断推动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发展,一是要推进政党外交指导原则时代化发展。即不断赋予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新型政党关系理念以时代内涵,为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发展提供原则遵循。二是要完善政党外交机制。

① 王存刚:《论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当代世界》2021年第3期。

② 参见刘雪莲、杨雪:《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选择》,《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③ 于洪君:《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9年,第154页。

④ 参见田旭、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

⑤ 参见张小军、任亚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机制的伟大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⑥ 参见于洪君:《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9年,第276页。

不仅要完善包括党的对外交往机制、党的对外信息传播机制等在内的横向机制，还要建立健全以政党高层对话会为核心的，覆盖政党之间各个层级交往的纵向机制。三是要深化政党外交实践。这就要求在实践中检验各项机制与政党外交实际的适配度，推动政党外交各项机制的完善，不断提升机制的有效性。

（四）统筹政党外交的关系网络，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合理规划政党外交关系网络是充分调动政党外交各方资源高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政党外交的关系网络分为内部关系网络和外部关系网络。科学统筹政党外交的内部关系网络，主要是统筹政党外交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执行机构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科学统筹两者的关系，一是要明确二者的权责定位。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要立足长远，科学把握政党外交总目标，合理制定政党外交方针政策，宏观调控政党外交各方资源，不能替代或直接干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作为执行机构，要负责政党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以及政党外交任务的有效执行，不能脱离、违背政党外交的总目标。二是要促进两者的相互配合。不仅要畅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沟通机制，还要畅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反馈机制，以机制建设推动两者互动常态化。

科学统筹政党外交的外部关系网络，主要是统筹政党外交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关系，推动政党外交的立体化发展。其一，促进官方、民间两种外交资源的互联互通。这不仅要增强官方外交的灵活性、提升对民间外交的援助、增进对民间外交的引导，改善影响互联互通的主体性因素，还要畅通和创新两者互动渠道、丰富两者互动方式，改善影响两种外交资源互联互通的客体性因素。其二，搭建统合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交流平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作为政党外交的执行机构，要积极在政党外交框架下举办圆桌会议，完善诸如“万寿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完善以政党外交为主，以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为辅的“三位一体”格局。其三，推动连接政党外交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平台的机制化发展，不仅要维护好连接政党外交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已有平台，还要打造全新平台，为政党外交有效连接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提供稳定驱动。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三重定位”，着力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层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在历史层面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与国家现代化的行为互动，在实践层面为政党外交服从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新境界。

（杨晓军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文 志〕